

制造“非地方”:对都市青年户外徒步的田野考察

■ 吴炜华 黄 珩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4)

【摘要】徒步、露营等轻型户外运动成为都市青年节假日出行的热门选项,衍生出独特的组织模式、社交场景和文化模态。本研究在青年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关照下,对当代青年的户外徒步展开探索。通过行人民族志的追踪与调查,本研究发现,都市青年通过户外徒步分别制造了现实、媒介与文化三个层面的“非地方”:在现实层面,都市青年为户外景观赋予了“诗和远方”的提升性想象,同时又在城市空间中实践着“反向芭蕾”,制造出抵抗城市生活常规的空间行动;在媒介层面,都市青年一方面脱离了社交过度连接的压力,另一方面以徒步专属的媒介工具转译出独特的行动者网络;在文化层面,都市青年在户外徒步时积极寻找和加入自己的趣缘圈层,以“风格物”和其他青年文化或亚文化模因激活独特的社交模式与文化表达渠道。

【关键词】“非地方” 户外徒步 青年文化 文化地理学

一、引言

“周日上午6点58分,北京地铁10号线的牡丹园站却如工作日一般拥挤。乘坐上行扶梯的都市青年们更改了工作场景中的装束,以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和登山包替换了西服与衬衫。而在出站口,不同户外徒步组织的领队们正挥舞各自的旗帜与标识,等候着他们。不远处停放着十余辆大巴车,它们即将载着这些青年徒步爱好者们前往郊区。”(田野笔记,20240609, BJ)

笔记中的场景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北京近郊出现。近年来,徒步、露营等户外运动越来越多地成为都市青年节假日的休闲方式与出行选择,衍生出独特的组织模式、社交场景与文化模

收稿日期:2024-07-11

作者简介:吴炜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文化、数字出版与融合传播、视听新媒体等;

黄珩,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互联网传播、青年文化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研究”(课题编号:22&ZD315)和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态。青年徒步爱好者们流动在各种各样的户外徒步群中,通过移动电话和微信公众号完成行动召集,随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徒步目的地,可报名加入一个临时建制、自主形成、松散且时空目的明确的徒步“自组织”。新组成的徒步“自组织”会在某个地铁站完成集合,继而包车组团前往郊区,在2-3名领队的协调管理下完成徒步行走,行程结束后回返集合地,自行解散。流连山野的徒步过程将“户外”建构成为了一个离开、颠覆和超越日常生活的“游戏世界”(a play world)^[1]。其中,由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勾连而形成的徒步人群,形成了一种极具地方感和媒介化的行动有机体,短暂但目标确定,单向度却深具身份特征的流动性,在书写着“诗和远方”的文化想象的同时,也编织着趣缘驱动的关系联结,以自我与群体的具身实践形塑着勾连城市青春与远方风景的意义空间。

都市青年群体的户外徒步活动标识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式的移动行为的形成,表征为青年群体借助社交关联和具身参与,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走向户外游戏世界,实现目的明确、轨迹清晰的空间位移,完成有计划的线上和线下同频的文化地理标记。移动行为使身体经验与时空延展紧密联结:“与移动相关的是远方、奔赴和陌生。移动具有积极的特质,如搜寻、新奇、探索、警惕和拼搏。通过移动,一个人拓展了关于距离、地方和空间经验的知识,开始对远方有了空间上和经验上的熟悉感。”^[2]都市青年的徒步实践以媒介驱动、具身移动和文化表达的共振与联动,触达着青年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集领域,将关于青年徒步的探讨从对一种潮流现象的分析,延伸向更为深远的学理空间。

二、文献回顾

(一)移动的隐喻:作为文本的轨迹

今天,移动正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生活经验。移动与非移动的辩证共存,牵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交织,催生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移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即以“由运动和变化驱动的社会科学”^[3]解析围绕移动展开的多元博弈。“总是被认为与新技术密切相关”^[4]的青年群体,更是在技术的赋能下完成了多样化的移动实践,使城市漫游、露营等基于空间移动的青年文化现象频频现身于学术研究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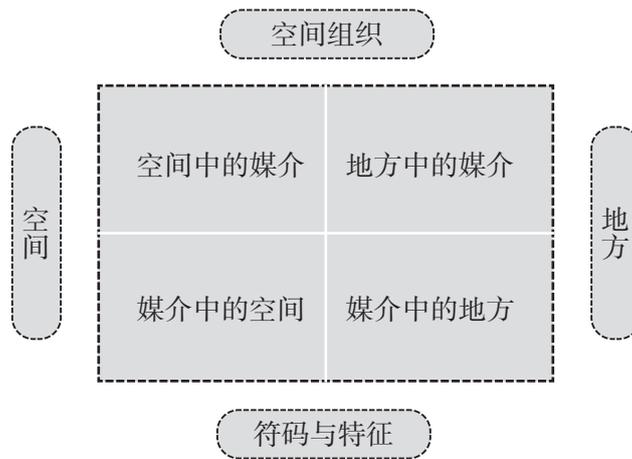
当代青年研究延续了本雅明、德塞托等社会学家的理论脉络,将青年群体的移动实践视作一种轨迹文本加以阐释。在“行人宣言”式的学术叙事中,行走、闲逛等移动实践是充满诗性的书写与言说方式,它们将身体在空间中移动的线条(line)融入了语言中句子的线条、地图上绘制的线条,创造了运动的、相互交汇的书写网络,成就了无数轨迹的碎片和空间的改变所塑造出来的多元故事^[5]，“幻影的轨迹中隐藏着改变社会的乌托邦种子”^[6]。后继学者由此切入当代青年群体的移动轨迹,对户外露营、城市漫游、日常通勤等不同形式的空间实践进行释读:从都市空间移动到户外世界的露营,衔接起都市空间隐喻的结构性困境、自然营地象征的逍遥乐土,以及其所根植的都市消费主义土壤^[7],在层层转译中“被转塑为一个承载丰富情感、聚集多方内容、召唤各类异质行动者的‘集合体’”^[8];作为城市内部移动实践的城市漫游(citywalk),成为青年群体抵抗时间异化、缓解内心焦虑、打破日常束缚的反向体验与自我和解^[9],同时,又促进了青

年群体“在身体节奏修复和街道游荡中重新感知城市时空结构,维系社会关系,主动构建起富有生态性的都市生活共同体,从而激发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0];已然内化于日常生活常规的通勤实践,则创设出具有特殊交流形式的“移动空间”,它见证着手机等移动终端对此交流情境的全面嵌入和消极影响^[11],也记录着通勤路上的个人所面临的工作失序风险及其抗争策略^[12]……

文本的比喻可以洞见移动实践的意义“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碎片化和不完整性”^[13],使之变得层次分明、清晰可见。然而,正如同对文本的解读离不开文本所处的语境(context)一样,对于移动实践所书写的空间文本进行解读,自然也无法脱离移动行为及其轨迹的背后媒介的嵌入方式、人的联结形式和空间语境的塑造与变化。本文所关注的都市青年徒步实践,恰在刻印移动轨迹的同时,形成了特殊的媒介使用模式、社交形式和空间生产形态。本文引入媒介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关照,在地方与空间的思辨语境中重新锚定都市青年徒步的位置。

(二)空间的思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关照

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是空间社会学、文化地理学中的一组基础概念。“从地方的安全和稳定中,我们意识到空间的开放性、自由和威胁,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允许移动的,那么地方就是停顿;移动中的每一次停顿都使得这一位置有可能被转化成为地方。”^[14]由此延伸,地方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15],而空间则是脱离了文化意涵的地方;地方意味着边界、身份认同、生活常规和对隐私的追求,而空间则意味着形式、流动和公共生活的观念。各种移动的实践,标记着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赋义,或从地方到空间的意义剥离。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四大分区的关系示意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介化社会日渐变得具体可感,促使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传播学的“空间转向”两股学术思潮相互激荡,涌现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交叉领域^[16],在“空间—地方”的理论光谱之外悄然开辟了“媒介(地理表征、符码)—现实(空间组织)”的崭新向度。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以两组关系分别为横纵坐标,开创性地提出了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知识图谱(如图所示),以空间中的媒介、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四个象限来重新整合和梳理了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与问题域^[17]。四象限示意图显示着媒介与空间研究

领域的多条分叉路径,并从中浮现出公与私、内与外、动与静、虚与实等对子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各种变化的可能性^[18]。

以此知识图谱为参照,都市青年的徒步实践充分体现着四个象限之间的交织与流动:徒步活动的组织模式对应纵坐标,展现着都市青年如何通过媒介符码与特征的流动完成召集,形成短暂集结的空间组织;徒步活动的移动实践则对应横坐标,折射出作为地方的城市和作为空间的“户外”之间相互转换的意义流动与文化生成。对比四个维度的静态划分,都市青年的徒步实践更多地反映出四个区域互相转换的动态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四个象限的边界,即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既有知识框架尚未阐明的理论空白。就像保罗·亚当斯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该示意图并非要将传播地理学的各种发现和理论隔离起来,本书引用的许多研究都无法直接归到任何一个区域中。”^[19]本研究试图寻找更具中介性的中层概念,以更进一步地分析都市青年徒步活动促使四大象限发生交织的文化过程与意义生产。

(三)“非地方”:居于边界的意义之所

本研究围绕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提出的“非地方”(Non-lieux)概念搭建理论框架,并将其视作居于文化地理学四象限边界的意义之所。在《非地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一书中,马克·奥热针对“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anthropological places)饱含关系、历史与身份认同的特征,提出了与之相反的“非地方”,即一个不具归属感,没有人际关系亦非历史性的空间,也是一个允诺孤独个体性、路过、暂时性与昙花一现的世界,包括了旅店、机场、车站、交通工具、主题公园、网络等^[20]。换言之,任何移动性的空间、标准化生产的空间和没有历史积淀的空间均可被视作“非地方”。在马克·奥热看来,“非地方”由超现代性(Surmodernité)创造,其本质特征是事件、空间与符号的“过剩”^[21],在时间、空间与功能上体现着临时性、过渡性与碎片化的属性,因而成为了“地方”之间的“填充物”。“非地方”不仅意味着不同功能性场所及其流动生活方式的扩散,更是在扩散中生成了一种新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其特征是个体身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与散落,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2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非地方”是作为“地方”之反面被提出的,但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转化的过程之中:“地方未曾被彻底抹除,‘非地方’也从未彻底实现”^[23],如同在一张白纸上不断进行着的身份与关系擦除与重写的游戏。“非地方”的建构,也始终围绕着这两个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展开,在“多元行动者共同介入的共享表征系统”^[24]中擦除与解构根植于“地方”的历史关系,也同时重写与生成了新的流动文化和身份认同。

“非地方”概念及其背后的两个文化过程,启发着研究者进入机场、连锁旅馆、商业街等典型“非地方”场景展开考察。一方面研究者以“一种关于失去的叙事”(a narrative of loss)^[25]探讨现代社会中地方感的消逝,指出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非地方”正导致旧有连接的消失^[26];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了“非地方”中新的流动性关系建构,例如“生活在云端”的商务舱乘客们在大型国际机场以基础设施的动态居住、身份的表面隔离和多重场所的意义建构重塑出的独特地方感^[27],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整合式“非地方”模型,以时间组织、声音景观和社会控制重组了娱乐、交通、招待和消费的“非地方”功能^[28]。以既有“非地方”研究为参照,都市青年的徒步行为是一场由媒介召集激活、促使都市青年从城市“地方”中抽离的移动实践,其中既有都市地方感的暂时抹

去,也有徒步专属文化意义的重新书写。因此,本研究试图将都市青年徒步爱好者在户外具身刻印下来的轨迹视作一种“非地方”的制造,并对其形成多层次的拆解。与此同时,本研究希望通过都市青年户外徒步的案例,对“非地方”形成一定的理论发展与贡献。一方面,超越“非地方”概念本身过于笼统的问题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29],重新重视不同身份的人对于“非地方”的多样化体验;另一方面,将媒介与传播的视角接合到对于“非地方”的描述中,以数字时代的新案例、新田野弥补“非地方”理论的时代局限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问题

基于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的提炼,本文将对以下具体的研究问题展开探寻。

RQ1:都市青年的户外徒步制造出了怎样的“非地方”?

RQ2:在“非地方”的制造过程中,都市青年经历了哪些意义的擦除与重写?

RQ3:通过“非地方”的制造,都市青年的户外徒步形成了怎样的文化表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行人民族志(Pedestrian Ethnography)的方法,对青年徒步爱好者展开了田野考察。行人民族志源自于人类学对于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方法论反思。随着空间流动的加速与数字化媒介的演进,许多田野工作所观测的场所正从过去静止的点(site)发展为动态的运动过程及其刻印的轨迹。“民族志研究者的行走行动”(ethnographer's pedestrian movements)的概念应运而生^[30],超越了传统民族志研究以地点为基础的范式,转而追踪信息提供者在线和离线的移动和实践^[31]。行人民族志体系下的田野点不再是既定的、固定的静止场域,而是由研究者的行动轨迹创造出来的动态区域。基于此,研究者一方面报名参与了不同户外徒步俱乐部组织的10场徒步活动,在徒步过程中实地追踪和记录了青年徒步爱好者们的活动轨迹与各种行为,并进行碎片化的访谈;另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考察青年徒步爱好者的线上轨迹。本研究的行人民族志依托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线上跟踪观察等具体手段,形成了立体的质性材料收集。

四、空间想象:现实“非地方”的赋义与建构

“徒步的时候,我总会想到一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M2)为挣脱禁锢于办公室、工位或教室的“眼前的苟且”,都市青年赋予了户外徒步实践关于“诗和远方”的空间想象,试图以此安放他们暂避日常生活压力、远离都市生活常规的愿景。“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的田野”构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空间张力:前者承载着日常都市生活日复一日积累而成的历史性地方感,敦促着都市“地方”中的每一个人按照“社会时钟”重复一成不变的生活;而后者则意味着截然不同的“非地方”式流动体验,使都市青年得以在现实层面脱离固化的社会关系与地方意义,借由身体的移动将自己接入到更为轻松的“非地方”之中。现实“非地

方”的制造由两个过程组成,一是对户外自然景观的理想化包装,在对比性的空间想象中将徒步实践所创造的流动空间建构成符合自己情感要求的形象;二是对城市日常通勤空间的陌生化重塑,以徒步者的足迹对都市“地方”形成反抗与改变。

(一)“诗和远方”:户外景观的理想化

在各大徒步组织的报名推送中,户外徒步的目的地多被冠以一种类比式的描述,将城市郊区的小景点和地貌相近的名山大川相互组合,形成了对户外景观的理想化包装。理想化包装的本质是一种“提升性想象”^[32],将徒步目的地与都市青年们难以在周末时间轻松往返的那些“远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京郊阿勒泰”“京郊小西藏”“京西香格里拉”等极具吸引力的标题映入眼帘时,徒步“非地方”作为情感符号的诗性特征正逐渐变得具象化。

风景不是某种客观事物,而是“一种独特的感觉,一种对自然或人工的外部世界进行体验和表达的方式,也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判断。”^[33]青年徒步爱好者们借由理想化包装,为心中的“诗和远方”提供替代方案:“周末时间太短,没有太多时间去那些更有名的景点旅游,那么京郊这些山就成了我们最有性价比的选择。说实话,徒步看到的一些风景真的不比那些大景点差。比如南大梁、麻田岭等等,就会让我觉得,北京也有自己的阿勒泰”(M6);“北京周边这些景区挺好的,地貌上可以充当很多地方的‘平替’。更重要的是可以一日往返,还便宜”(M7)。对于户外景观的理想化包装也贯穿着徒步的始终,出现于本研究的多个田野瞬间:“M2在他的家庭微信群里发送了自己拍摄的视频。视频里,是蔚蓝天空下广阔的高山草甸,不时有牛羊跑过,远处的山峰层峦叠嶂,绵延不绝。M2激动地向他的家人们介绍,‘就在离北京车程两个多小时的地方,这里的景色可一点都不输内蒙古的草原!’”(田野笔记,20240609,HB);而在春日的另一场徒步中,“二十余人行进在被桃花簇拥着的山间小道上,有成员应景地谈论起了自己家乡的桃花,表示这次徒步让他像回到了南方的家乡一样,恍然若梦”(田野笔记,20240323,BJ)。

户外景观的理想化包装,揭示着徒步“非地方”如何寄托着来自“远方”的种种意义,成为了空间意义上的移情文本:远方景点或家乡的地方性特征正从其原初位置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合进入了徒步实践所制造的“非地方”,构成了情动(affective)的驱动力量。哲学意义上的情动是身体之间主动或被动的互动过程,会增进或减退身体活动的力量,亦对情感的变化产生作用^[34]。德勒兹对情动的阐释则进一步强调了:情动是一种力量的度量,包括横向意义上一个身体蕴藏的能力,以及纵向上不同身体之间的交互力量^[35],由此催生出人文社科领域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为探索具身体验、情感建构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情动超越了物质的物理限制,它与物质的共振使地理位置、商品、图像和声音充满活力。”^[36]在此视域下,户外徒步构成了徒步者的身体与户外景观的情动交互,每个热爱徒步的都市青年都有自身独特的生命历程、对徒步地点的偏好、独属于自己的对于“远方”的理解,包含着因人而异的情感共鸣逻辑:“大家徒步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有人想锻炼身体、挑战自我,有人想找到家门口的美景,还有人是为了在一个更放松的环境里结交新的朋友。”(M7)因此,作为移情文本的徒步,催生出了一个以身体参与、人际互动和情感共振为主线的“非地方”,户外徒步实践由此幻化为具有表现力的一系列符号,寄托着都市青年们在情动驱动下所追寻的想象目标。

(二)反向芭蕾:城市空间的陌生化

除户外景观的理想化建构外,都市青年的徒步实践同样对都市“地方”的内部产生着影响。在徒步开始之前,徒步爱好者们往往需要自行前往集结地点:“徒步的起点并非山脚,而是从城市各处前往包车集结点的这段过程。地铁、公交等交通方式是大多数徒步爱好者们的选择”(田野笔记,20230826,BJ),徒步“非地方”由此嵌入城市空间的移动秩序和地方感体系之中,以空间行动消解都市生活的节奏常规与熟悉氛围,完成着一场以陌生化为特征的空间改造。“复杂与多变的空间改造能够产生一种杂交性的创造物。它刚开始表现为一种话语、一种观看和谈论地方的方式,继而带来对那个地方的全面改造,新的想象地理由此变成具体的现实。”^[37]徒步“非地方”在城市“地方”中留下了一道道刻痕,形构出独特的抵抗模式。

城市中充满移动和变化的秩序就像一种动作错综复杂的舞蹈,“其中既有各个舞者的动作,也有整体的动作,个体之间互相映衬,组成一个井然有序、统一和谐的整体。”^[38]此种由身体移动形成的城市艺术形式也被称为“地方芭蕾”(Place - Ballet),由个体的“身体芭蕾”(Body - Ballet)和“时空惯例”(Time - Space Routine)两个组成部分:“身体芭蕾是为了完成一项特定任务的一系列完整的姿势和动作;时空惯例是一系列习惯性的身体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占据很长时间;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在一个物理环境中相互作用产生地方芭蕾。”^[39]地方芭蕾因其对持续的、常规的人类活动的维持,促成了一种强烈、深刻的地方感。都市青年节假日的户外徒步,则在城市中展演着一种反向的地方芭蕾:他们并不按照时空惯例排布自己日常通勤中的身体行为,反而在涌向郊区的集体移动中抹去城市空间的日常意义,由此在城市空间中建构出了特殊的、陌生化的“非地方”。地铁是城市中地方芭蕾集中出现的“剧场”之一,“一种浪漫的性质随地铁剧场而生,特别是在交会站的通道里,打此经过的乘客转换地铁线,就好比在固定的时间转换生活形态,也转换象征的系统和实践。”^[40]作为徒步爱好者从市内去往集结地点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地铁亦是反向芭蕾的实践之所,“每次坐地铁去徒步的时候,都会有很奇妙的感受。平时坐1号线、10号线都是上下班通勤,所有人都在一种‘班味’的状态里。但徒步时,同样的地铁场景,大家却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挎着登山杖,仿佛在一起抵抗某种一成不变的疲惫”(F1);“每次在地铁上和徒步装扮的人进行眼神交汇后,我们往往很默契地会心一笑,有一种互相确认身份的感觉”(M2)。在都市生活的地方芭蕾中,空间通过人际间的时空共享变成了地方,形成了繁忙、高压、快节奏的地方感;而徒步青年的反向芭蕾则在一个个周末的清晨为地铁等典型的都市地方提供了再陌生化的可能,完成着“非地方”短暂的符号建构与意义复写。

五、轨迹刻印:媒介“非地方”的抽离与重塑

人类移动经验的媒介化趋势正成为一种事实^[41]。媒介的剥离与再现,在徒步“非地方”的制造中同样无处不在:一方面,户外的特殊空间环境切断了网络信号的传输,使徒步者得以从日常的媒介世界与社交网络中逃离;但在另一方面,对讲机、徒步软件、智能手环等媒介设备却记录甚至共享着户外徒步的轨迹与数据,以此重塑和延伸着户外徒步的专属媒介联结。媒介的抽离与再嵌入,呼应着“非地方”对于关系的擦除与重写。因此,都市青年在户外徒步中的媒介使

用之印记、媒介选择之历程,亦建构出了媒介层面的徒步“非地方”。

(一)抽离:从日常媒介世界逃逸

在“非地方”概念的建构中,马克·奥热因网络空间的流动性而将其归类为“非地方”。我们见证着从网络传播到“平台化”社会、从参与式文化到连通式文化的巨大转变^[42],网络所象征的连接性正更多地成为一种地方性特征,而非“非地方”属性,因为工作沟通的需求、熟人社交的压力完成了对网络空间的侵蚀,曾经作为“非地方”的媒介世界正逐渐转变为现实“地方”的镜像。此时,户外徒步实践为都市青年提供了从日常媒介世界逃逸的“通道”,将他们从无处不在的连接与地方镜像中解救出来,进入徒步的媒介“非地方”：“走上山路半小时后,手机信号开始一格一格地减弱,直到完全消失。平时不断响起的消息提示音此时销声匿迹,宣告着徒步者们进入了一个没有网络连接的户外世界”(田野笔记,20230826,BJ)。徒步过程中,都市青年对手机这一“电子器官”的依赖也被极大削弱,因为即使是拍照,徒步者们也必须停下脚步,按照领队“走路不拍照,拍照不走路”(田野笔记,20230826,BJ)的基本要求使用手机,形成了徒步“非地方”反连接的一幕。

此种反连接情形在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构成了他们在高强度的连接性包围下所追求的喘息空间：“第一次参加徒步的时候,还挺不习惯大半天没有信号的情况,会有点焦虑。但慢慢地就开始享受这种逃离魔爪的快乐了”(M6);“徒步的放松不仅仅在于郊外新鲜的空气,更在于我终于可以在几个小时里离开通知、离开消息,专注于风景和运动”(F8);“徒步跟普通的旅游很不一样,普通的旅游只是离开了自己工作的地点,工作消息和社交网络依然包围着我;但户外徒步属于双重逃离,不光离开了工位,也躲过了各种信息”(F10)。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割裂、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对“外存”的过度依赖等种种弊端,让现代人饱受过度连接之苦,反连接也许将成为互联网的新法则^[43]。户外环境对网络信号的切断,满足了都市青年对反连接的愿景,促使徒步“非地方”从以连接为根基的数字媒介丛林中抽离出来,进而创设出了一个充满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和运动活力,而无冗杂消息通知的“后花园”。徒步“非地方”为都市青年们的短暂弥合了社交倦怠(social fatigue)的情绪与实质性的脱离行为之间的断裂^[44],让“诗和远方”的想象得以最大限度地逃离众声喧哗的社交场和媒介网。

(二)重塑:专属媒介联结的搭建

户外徒步对日常媒介连接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媒介使用行为的消失,相反,都市青年在徒步过程中积极应用着对讲机、专业徒步软件、智能手环等媒介工具,重塑着专属于徒步共同体的媒介联结与关联性行动,重叙着徒步“非地方”的关系认同。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行动只有在在一个已经开放、平坦和缩小到一定规模的场域才有可能,在那里,形式、结构在微小的管道中循环,它们的每一个应用都需要依赖于大量隐藏的潜力”^[45],青年徒步者与各种徒步专属的媒介物以行动者的姿态,留下诸多经验层面上的痕迹与互动,从而建构出徒步“非地方”不断变化的动态媒介物网络。

对讲机携带着略显古老的无线电技术,在数字时代的户外徒步中大显神威,成为了徒步“非地方”特有的媒介基础设施。“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形下,徒步团队内部选择使用对讲机进行实时交流。在徒步开始前,领队会在微信群中发送本次徒步使用的频率和亚音。几位领队和配备

对讲机的徒步者共同形成了一张随着徒步轨迹移动的传播网络”(田野笔记,20230826, BJ)。对讲机的使用最初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对讲机是徒步场景里最好用的通讯工具,我每次都会带着,这样可以让我随时和大家保持联系,比较安全”(M4)。但在实际应用中,嵌入徒步进程的对讲机显露出了层次丰富的传播功能:“分散在队伍中的领队们通过对讲机确认各位队员的位置与行进进度;徒步者们有时会通过对讲机获取信息,例如何时能到达午餐地点;徒步团体中的孩子会经常好奇地在对讲机里说话,听到自己的声音如何被传输到另一台对讲机上,其家长则会借机向他们讲解无线电通讯的原理”(田野笔记,20240330, BJ)。此刻,对讲机作为一种物质性的行动者融入了徒步团体的意义网络,转译出日常互联网之外的专属联结:其发出的专有频率和亚音框定着一个徒步团队的范围,又勾连着户外运动的安全保障、内部传播的基本需要,甚至亲子互动的有趣仪式,重塑着媒介层面的徒步“非地方”。

专业徒步软件 and 智能手环等搭载于数字媒介的智能徒步工具,同样在都市青年的户外徒步中呈现出伴随性的特征,以智能设备对运动中身体参数进行量化与记录的行为已然成为了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映照技术与身体的持久呼应、推动与强化^[46]。“量化身体”的潮流亦体现于户外徒步之中,“我徒步时会习惯打开徒步软件,记录下自己的轨迹,好像没记录上就是白来了”(F5);“我的智能手环有户外徒步这个运动选项,我徒步的时候都会打开,这样可以看到我行进的距离、爬升的高度,特别有成就感。实时监测心率、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M2);“智能手环和徒步软件相互配合,我就能看到我已经走了多少路,判断还有多久到终点,这样更能坚持下去”(M9)。

“两步路”“六只脚”等专业徒步软件更是因轨迹记录、离线导航等“硬核功能”(M4)受到徒步爱好者们的喜爱与推广,“每次参加徒步,领队都会在去程的大巴车上向所有人科普专业徒步软件的用法和重要性”(F3),甚至有的领队会“走到每个人的身边,指导他们下载专业徒步软件,并确认大家会使用基本的功能”(田野笔记,20240622, BJ)。徒步软件不仅能记录下徒步者的行进轨迹与相关参数,还能完成这些数据的公开分享,实现轨迹的共享与徒步地点各种信息的实时更新,而这种共享的范围有时超乎徒步爱好者们的想象。在新西兰库克山国家公园进入徒步田野时,“我惊讶地发现,国内某款徒步软件上竟然有人分享过这条步道的轨迹。于是我就按照该轨迹的导航进行了当天的徒步,路线标注非常准确。路上我还为来自日本和韩国的青年徒步者指路,带着他们一起沿轨迹行进”(田野笔记,20240706, NZ)。户外徒步的专属媒介联结在此时完成了蜕变,使户外徒步的媒介“非地方”与现实“远方”有力地联系在一起。

有批评观点指出,技术和大众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地方的独特性,“由于人们对地方的重要性越来越不敏感,因此有特色的地方被随意铲除,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景观。”^[47]而都市青年丰富的媒介使用却使得徒步中的专属行动者网络脱离了日常的媒介世界,转而以个性化的联结与记录刻印下了实践的身体文本与“非地方”轨迹,赋予了徒步“非地方”独特的归属感。

六、意义展演:文化“非地方”的拼接与生产

在文化层面,徒步“非地方”也承载着积极的意义展演。在这片由一众陌生人组成、脱离了日常社交压力,并在徒步后迅速解散的“非地方”场域里,都市青年们分享着作为异质性表达的

潮酷穿搭,挪用、模仿和传播着源自于动漫、游戏的“最火徒步姿势”,也在随行过程中以碎片化的文化/亚文化符号或物件激活圈层的共振与社交的发生。现实“非地方”的赋义、想象和媒介“非地方”的抽离、重塑,最终完成了拼接和融汇,共同形成户外徒步的文化“非地方”,整体呈现出“拼贴主义”的特征:“人们有意无意地从现有的社会和文化中汲取碎片,再由此拼成一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正式与非正式杂糅的风格”^[48]。通过徒步“非地方”,青年文化的诸多特征得以变得可见:如小众圈层的重聚、搭子社交的模式,乃至社会责任的注入。

都市青年的户外徒步以不同“风格物”的“乱入”与拼贴,唤醒着部分青年心中的集体记忆,使一些已然消散的小型共同体在徒步“非地方”重新完成聚集。在青年社会学研究中,“物”是能被赋予风格、联结青年主体的社会文化对象,勾勒出无数“‘风格’物件被反复赋予意义的过程”^[49]。户外徒步活动自带登山包、冲锋衣、登山杖等多种运动装备,使徒步过程中出现多种“风格物”交织的场面。M2曾在一次徒步活动中背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背包,这一极具时代属性的风格物迅速引发了同行者的关注。“有两位同行者好奇地询问M2,‘你是冬奥志愿者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畅聊起当时所在的场馆和所做的志愿工作。其中两人曾同在‘冰立方’进行志愿服务,感叹着他们竟然在徒步的情境中完成了重逢”(田野笔记,20240323,BJ)。集体记忆的共鸣实则昭示着小型共同体及其“非空间”在解散、消失一段时间后的惊喜重现,与徒步“非空间”形成了丰富的情感互文,“这段已经很久没有触碰过的回忆,突然在这种随机性、流动性很强的场景里冒出来,很奇妙”(M2)。在此瞬间,两个“非空间”超越了时空的阈限,迸发出遥相呼应的互动仪式。此种文化仪式的勾连不仅是群体的高峰,也是个人生活的高峰:“它们赋予了我们个体生命的意义,有时使我们执迷地想去重复它们:或参加某次大的集体事件,或作为观众参加某一激动人心的流行的娱乐或体育活动……在这些时刻,具有高度的专注意识和高度的共享情感时,这些个人体验也可具化为个人符号,而且在用符号重新展现一个人的或大或小的生活领域的拓展中保持活跃状态。这些是重要的塑造个体的成长性体验。”^[50]

基于集体记忆的唤醒和互动仪式链的激活,不同趣缘圈层的专属符号在徒步“非地方”完成了拼贴,以青年文化和亚文化模因(meme)的流动延伸改变着都市青年的社交网络。在数字社会“单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人不再是传统相对粗糙测量方式中被平均值代表的个体,而是被更加精细、透彻测量方式所获取、分析和评价的单体人。”^[51]青年愈发倾向于依赖互联网等非传统方式来建立连接,催生出“同好”“搭子”等更具参与性的“找组织”式的社交秩序^[52]。户外徒步活动本身就具有“搭子社交”的属性,通过媒介召集了众多“徒步搭子”,在群体移动中共同书写着徒步“非地方”;与此同时,围绕其他文化对象建立的趣缘圈层同样会附着在徒步爱好者的身上,令他们在徒步中彼此确认身份,找到各自的“组织”。例如,在一次徒步活动中,“有一对情侣携宠物狗同行,他们的雪纳瑞立刻成为了徒步队伍的‘团宠’。不断有成员弯下身子,向小狗问好,抚摸它的脑袋,为它拍照,并在征求主人同意后向其喂食。同样在养宠物的徒步者则不断与这对情侣攀谈,交流豢养宠物的各种心得。一直梦想拥有自己小狗的F1更是多次来到雪纳瑞的身边,逗它玩耍”(田野笔记,20240622,BJ);徒步中常常出现的音响同样能够制造出圈层化的声音景观,“在徒步过程里,领队随身携带着一个小音箱,播放着新裤子乐队、痛仰乐队等独立乐队的歌曲。M8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与领队歌单的相似性,便跟在领队身边愉快行

进。他们聊起了各大音乐节的抢票攻略,并对这些歌曲给予了自己的评价”(田野笔记,20240526,BJ);而在一次徒步的午餐时分,“几位学生徒步者在知晓他们来自相似的专业背景时,将徒步野餐无缝转化为了‘学术午餐会’和‘专业吐槽会’,在树影斑驳的午后,就着面包开启轻松的畅聊”(田野笔记,20240609,HB)。

徒步“非地方”还在青年参与的推动下,完成了一些更为深刻的拼贴与结合,将都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融入了徒步文化。“在徒步过程中,领队突然停下,向周围的六个人讲解香蕉皮、橘子皮、塑料袋等垃圾在野外自然降解所需要的时间,以此强调在徒步时保护环境、不留下垃圾的重要性。随后,他提到了一家创立于2020年的户外环保公益组织,介绍了一系列环保行动,动员大家在未来共同参与”(田野笔记,20240323,BJ)。此类与环保公益相结合的徒步活动,旨在组织都市青年去往郊区的各个景点,一路收集沿途的垃圾,带下山去,重新分类并做处理。在该组织的微信公众号上,“享受自然,更要守护自然”的标语出现在每一期活动征集的开头。“生态环保成为新时代的生活时尚,不仅仅带来志愿服务的新内容,而且也带来工作生活发展的新领域,成为青年发展的新空间”^[53],而徒步“非地方”成为了生态志愿文化的理想聚集地,书写着都市青年的参与热情。

曾有学者呼吁,青年研究应从单数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中跳脱出来,关注到复数的青年生活方式(youth lifestyles)^[54]。而都市青年在徒步中制造的文化“非地方”,正体现着此种复数的青年经验与文化图景,我们得以瞥见都市青年多种多样的体验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压力中脱离,再重新拼接进入户外徒步的特殊环境。文化层面的徒步“非地方”折射出都市青年面对当下生活所做出的不同回应,都市青年也能在徒步“非地方”中找到自己的意义空间与文化寄托。

结语:本文以行人民族志的方法取向,辅以深度访谈和线上观察,追踪和记录了都市青年的户外徒步活动及其文化生产过程。在青年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对话中,本研究发现:都市青年在户外徒步的移动实践中制造着一种独特的“非地方”。徒步“非地方”以移动性的青年文化书写抹去了日常都市生活的文化常规与社交压力,转而成为都市青年安放情感寄托、完成更自由的文化表达的流动场域。对徒步“非地方”的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都市青年赋予了户外徒步以“诗和远方”的提升性想象,同时又在城市空间中实践着“反向芭蕾”,制造出了户外徒步的现实“非地方”;然后,在徒步过程中,都市青年脱离了日常媒介网络与社交连接的压力,转而以徒步专属的媒介工具转译出媒介“非地方”;最后,都市青年们会在“风格物”和其他青年文化或亚文化模因的激活下延展独特的社交模式与文化表达渠道,形成了徒步的文化“非地方”。

户外徒步作为都市青年喜爱的一种实践活动,承载着他们对于逃离日常生活节奏桎梏、摆脱日常连接压力和放松身心的美好愿景,延伸出了可供情感表达和文化展演的意义之所,使都市青年们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所畅想的“非地方”中以一种短暂、流动的弱关系连接完成各种目标。徒步“非地方”的制造与消散并非是一个二元命题,而是一场场相互交织、循环往复的过程。如同每一场徒步富有仪式感的结尾:“大巴到达上午出发时的地铁站,徒步者们纷纷下车,沿着星罗棋布的都市地铁线路重返各自的日常生活,等待下一次徒步行动的聚集”(田野笔

记,20240622,BJ),热爱徒步的都市青年们在徒步“非地方”与日常城市生活的“地方”之间来回穿梭,于意义的擦除与重写中留下青年文化的叙事痕迹。

[参 考 文 献]

- [1] Burch, W R. The Play World of Camping: Research Into the Social Meaning of Outdoor Recre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5, (5).
- [2] 戴维·西蒙:《生活世界地理学》,周尚意 高慧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4页。
- [3] Urry, J. Mobilities, Cambridge: Polity, 2007, p.18.
- [4] Livingstone, S. M., Haddon, L. Kids Onlin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Children, Bristol, Portland: Policy Press, 2009, p.1.
- [5]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93.
- [6] Duncan, J. S., Ley, D.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81.
- [7] 兰凯伦:《“诗与远方”:都市青年的露营实践与浪漫主义异托邦的生产——基于2022年西安市的田野调查》,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0期。
- [8] 孙志鹏:《青年“精致露营”现象的流行表征、时代成因与多维功能》,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9期。
- [9] 张爱红 吴元浩:《亚文化景观下当代青年城市漫游的实践逻辑》,载《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3期。
- [10] 曹国东 毛瑀涵:《流动的“灵韵”:当代青年的城市漫游与生活共同体建构》,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6期。
- [11] 卞冬磊:《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年第47期。
- [12] 王 昀 张逸凡:《即刻联结与流动“办公”:通勤情境中的新闻从业者及其生产实践》,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7期。
- [13] Barnes, T., Duncan, J. 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7.
- [14]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6.
- [15] Cresswell, L. T. 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Transgression,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3.
- [16] 袁 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
- [17][19] 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袁 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 [18] 毛万熙:《“空间”如何进入媒介研究:理论源流、研究路径与问题域》,载《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7期。
- [20][21] 马克·欧杰:《非地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陈文瑶译,台北:田园城市2017年版,第85、37页。
- [22] Gebauer, M., Nielsen, H. T., Schlosser, J. T., et al. Non - place: Representing Placelessness in Literature, Media and Culture,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0.
- [23] Collins, S. G. “Head Out on the Highway”: Anthropolog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Supermodern, Postmodern Culture, 1996, (1).
- [24] Lamont, M., Beljean S., Clair, M. What is Missing? Culture Processes and Causal Pathways to Inequality, Socio - Economic Review, 2014, (3).
- [25] Arefi, M. Non-place and Placelessness as Narratives of Loss: Rethinking the Notion of Pl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999, (2).
- [26] Kunstler, J. H. The Geography of Nowher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 - made Landscap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246.
- [27] Zuskórová, V. “Where are You?”: (Auto)ethnography of Elite Passage and (Non) - placeness at London Heathrow Air-

- port, *Mobilities*, 2023, (6).
- [28] Gottschalk, S., Salvaggio, M.. Stuck Inside of Mobile: Ethnography in Non – Pla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5, (1).
- [29] Merriman, P. Marc Augé on Space, Place and Non – Places, *Irish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2009, (1).
- [30] Coleman, S., Collins P.. Locating the Field: Space, Place and Context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20, p.67.
- [31] Leander, K. M., Mckim, K. K.. Tracing the Everyday “Sittings” of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 a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Ethnography Acros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2003, (2).
- [32] Wright, J. K.. Tarrae Incognite: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
- [33] Cosgrove, D.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 p.9.
- [34] Spinoza, B.. *Ethics*,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54, p.195.
- [35] Deleuze, G., 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7, pp.260 – 261.
- [36] Newell, S.. The Affectiveness of Symbols: Materiality, Magicality, and the Limits of the Antisemiotic Turn,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8, (1).
- [37] Duncan, J. S., Gregory, D.. *Writes of Passages: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51.
- [38]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1961, p.50.
- [39]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 [40] 马克·奥热:《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周伶芝 郭亮廷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
- [41] Keightley, E., Reading, A.. *Mediated Mobilit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4, (3).
- [42] 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 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 [43] 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
- [44] 赵启南:《关系性压力下青年使用者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及其行为结果》,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6期。
- [45]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7, p.128.
- [46] 许彤彤 邓建国:《“量化自我”潮流中的技术与身体之同构关系研究——以运动应用程序 Keep 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5期。
- [47]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90.
- [48] Cleaver, F.. *Reinventing Institutions: Bricolage and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2, (2).
- [49] 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修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
- [50]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 王鹏 宋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1页。
- [51] 谢洋 王曦影:《21世纪全球Z世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 [52] 严艺文:《重制游戏规则:青年自组织合作秩序的生成》,载《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4期。
- [53] 谭建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与青年发展——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 2025年)〉的多维度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 [54] Miles S.. *Youth Lifestyles in a Changing Worl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

(责任编辑:张丹)